

《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

「毛主席到重庆」的采访

王淮冰

采访将军、诗人冯玉祥

丁涪海

采写「沈崇事件」的回忆

刘时平

报人生涯三十年

张友渔

《新华日报》副刊研究

徐光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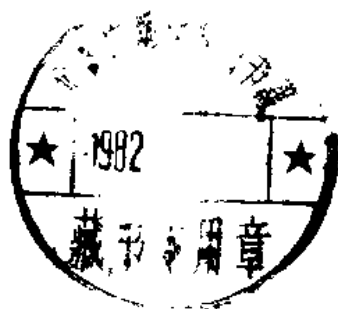
中国展望出版社

新闻研究资料

新闻研究资料 丛刊

总第十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十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

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80,000字

1982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271.032 定价：0.80元

目 录

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

“毛主席到了重庆”

——忆三十六年前的一次采访……………王淮冰（1）

一次偶然的采访

——记周总理1959年接见电影界……………丁 浪（7）

自称小伙子 实乃老少年

——采访将军、诗人冯玉祥……………丁涪海（12）

忍耐的收获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采访……………杨 纪（19）

采写“沈崇事件”的回忆

——旧闻新忆之一……………刘时平（27）

五天五夜送鸭记……………满运来 焦保强（34）

一次没有采访的采访……………徐 熊（43）

鄂中探险记……………冯英子（55）

《新华日报》副刊研究

“新华副刊”在文艺战线的斗争……………徐光霄（62）

“新华副刊”探索……………关世申（68）

写 作 研 究

一篇国际杂文的诞生

——写《语无伦次的约翰逊》前后……………杨德华（101）

回 忆 录

报生涯三十年.....张友渔 (111)

访内山完造和鲁迅故居

——在北京采访留下的片断史料.....孙世恺 (132)

难忘的一天

——1946年“二·一〇”纪事.....尚 丁 (147)

怀印度同业.....子 冈 (157)

湖南报纸研究

《湘报》和《湘学报》.....辛文思 (162)

出 版 史 料

记北京地下党领导的部份新闻出版工作.....李 越 (188)

报 刊 史 料

回忆《民主报》.....冯克熙 (210)

记报刊上的漫画事件.....毕克官 (228)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 (五)

.....方汉奇 谷长岭 冯 迈 (235)

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

编者按：为了留下珍贵的新闻史料，并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提供宝贵的采访经验，本刊增辟了“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这个栏目。约稿信发出后，得到了许多新闻记者的支持，他们纷纷寄来了稿件。这些稿件，有的写下了珍贵的新闻史料；有的通过记叙不同的采访活动，再现了记者当年不畏艰险，深入实际进行采访的艰苦生活。他们从不同角度，以亲身经历和体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给人以教育和启示。现在我们先登出八篇，其余以后陆续刊登。我们热切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大力支持，为本栏撰写既有新闻史料，又有采访经验的稿件。

“毛主席到了重庆”

——忆三十六年前的一次采访

王 淮 冰

我干了大半辈子的新闻工作，由于职业的关系，有机会目击了许多重大历史场面。作为一个记者，使我终身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活动，要算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重庆九龙坡飞机场，采访毛主席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个震动中外的重大新闻。如今事隔36年，新闻早成历史，但是，毛主席和

周恩来同志，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智大勇，不避艰险，深入虎穴，并肩战斗的光辉形象，仍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获得了最后胜利。几天以后，我从贵阳到了重庆，准备去武汉，筹备出版《大刚报》。在等候船票期间，我去看望了《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同志。当时，蒋介石接连电邀毛主席来重庆谈判，谁都知道，这是在玩弄政治花招。毛主席会不会冒险到重庆来呢？这是人们心头存在的疑问。

8月28日中午，烈日当空，重庆这个有名的大火炉，热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正当我一边挥动芭蕉扇，一边吃午饭时，石西民同志坐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吉普车，突然来到住处。他告诉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即将由延安飞抵重庆，约我和《大刚报》驻渝记者同去九龙坡机场进行采访。我们喜出望外，立即放下饭碗，登上了汽车。途中，又约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同志和《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同志，最后接了郭老（沫若）夫妇。一辆小小美国吉普，竟然塞进去八个人，实在挤得够呛。由于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大家都在思索着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汗水浸透了衣衫，谁也没有喊热。“僵持八年，令全国非常焦急关注的国内团结问题，已因中共领袖毛泽东氏飞临陪都而开朗。”这句新闻导语，就是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开始构思的。

我们赶到飞机场，走进候机室，看到各党各派人士已经先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几位老先生，他们不时探首室外，向空中张望，盼望着毛主席早点安然到达。奇怪的是，谈判的另一方国民党，到机场欢迎的却寥寥无几。我环视整个候机室，只看到周至柔、邵力子、雷震等几个

人。周至柔这个国民党空军司令，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是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前往机场的，他一个人孤单地站在那里，高傲地昂着头看天花板，目中无人，人们自然也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新闻界的朋友开玩笑说：“不愧是‘独夫’的代表。”

在候机室内，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外国记者比中国记者多。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动了；而重庆有几十家报纸和通讯社，还有一批外地报纸派驻重庆的记者，他们人数远远超过外国记者，可是，今天到机场采访的，却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还是《新华日报》约来的。从这一简单事实，既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又可以看到国民党封锁新闻的手法。

我因刚到重庆，人头不熟，采访遇到了困难，西民同志就陪我一道活动，替我作介绍。我访问了黄炎培先生，他去过延安，与毛主席曾作尽夜谈。他表示，过去国共谈判，完全由他们这些中间人奔走折冲，因此，徒劳无功。这次毛主席亲自来重庆，双方直接谈判，已使问题单纯化。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对国共和谈，事前无所闻，他说：“我尚未得到当局的邀请。国共谈判，各党各派是否参加，不得而知，但只要双方开诚布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看到邵力子先生安详地坐在藤椅里，闭目养神，想从他口中了解一点国民党的看法，请西民同志替我介绍。石感到有点为难，笑笑说：“这不合适吧！”我一想，是呀，国共两党是对手，共产党员怎么好替我向国民党官员作介绍呢？于是，我就直接把名片递给邵先生，请他谈谈自己的观感。邵笑而不语，似乎向我说，他是以个人身份来表示欢迎的，有什么可说的呢。

毛主席乘坐的专机，中午12时从延安起飞，航行三个多小时，终于安然着陆。舱门启处，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毛主席。

他身材魁伟，举止稳重，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蓝布中山装，脚穿黑色牛皮鞋，从上到下，都是延安新做的。毛主席缓步走下飞机，一群外国记者蜂拥而上，镁光灯闪亮，照相机“咔”“咔”，他们争先把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拍了下来。

紧随着毛主席走出机舱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政治部长张治中，他们是专程去延安迎接毛主席的。接着，周恩来同志走出机舱，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衣着虽旧，但整洁、合身，给人以朴实、精明、干练的印象。

当张治中把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介绍给毛主席后，《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抢先赶到毛主席身旁，亲切握手，互相问候，他们说的是一口道地的湘潭家乡话。“他是谁，和毛泽东这样熟！”许多人不认识熊瑾玎同志，觉得有些奇怪。正当欢迎代表彬彬有礼地向毛主席走去时，中外记者都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一拥而上，把毛主席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和毛主席握手。而各党各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接近毛主席。沈钧儒先生，年纪大，身材小，体力差，他在人缝里，口里喊着“我是沈钧儒”，用尽了气力，也无法挤进记者们的包围圈。

正在一旁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们握手问好的周恩来同志，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敏捷地把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真有效，一下子把一群记者吸引过来。周恩来同志看到毛主席已能和各党各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礼品”，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主席的书面谈话。在这篇简明的谈话中，毛主席“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

来”，“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建设独立自由富强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一张油印的书面谈话，对于记者们来说，的确是极为珍贵的。外国记者们拿到书面谈话稿，飞身跳上汽车，一溜烟赶进城抢发新闻去了。外国同业们“争分夺秒”的“抢劲”，是我们中国同业所不及的。

毛主席到了重庆，山城的人们还在争论着毛主席会不会来。我完成了采访任务，乘了《新华日报》的大卡车，回到城里，金仲华和刘尊棋两位国际问题专家，还在热烈争论着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的争论可以结束了，我刚从飞机场来，毛主席已经到达重庆。”

回到归元寺《大刚报》驻渝办事处，我顾不得吃晚饭，赶写了一篇近千字的新闻稿，通过长途电话，连夜发到贵阳《大刚报》。打长途电话虽然比发电报要快，但是，经常断线，声音又不清楚，真把人的喉咙都喊破了。等到稿子发完，已是夜深人静。从归元寺俯视山城，万家灯火，像是读者们的张张笑脸，使我无比欣慰：“今天的新闻传播者，明天就是历史的见证人。”

1982年2月16日

附录：

毛泽东昨抵渝

即晚应邀赴蒋主席官邸晚宴

毛氏书面谈话强调民主团结

（本报重庆二十八日专电）：僵持八年，令全国非常焦急关注之国内团结问题，已因中共领袖毛泽东氏飞临陪都而开朗。

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两氏，于今日十二时在美大使赫尔利、张治中将军陪同下，乘美军用机三小时三十分之飞行，已抵达陪都。蒋主席特派侍从室主任周至柔代表欢迎，其他赴机场迎接者有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付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领袖张澜、左舜生，文化界人士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及中外记者等百余人。毛氏身着蓝色布中山装，灰色拿破仑帽，黑皮鞋。毛氏首先下飞机，张治中将军即介绍与蒋主席代表周至柔将军相见。毛氏谓：“不敢当”，旋即由周至柔介绍与各党派领袖及文化界人士、中外记者一一握手。毛氏态度谦恭，予人以深刻印象。最后，周恩来氏将自延安带来之书面谈话，分发各记者。毛氏旋即偕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乘车入城，赴张部长私邸休息。本报记者曾与欢迎之各界领袖接谈，认为团结前途，因毛氏之来渝谈判，必然乐观。黄炎培谓：过去谈判，完全是中间人奔走折冲，以至双方虽无大距离，然每徒劳无功。此次毛氏亲来，已使问题单纯化。张澜氏表示：彼尚未接得当局邀请。对于谈判，各党各派是否参加，不得而知。只要双方开诚布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闻毛氏并将于日内招待中外记者。毛氏书面谈话称：“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之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团结之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之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原载1945年8月29日贵阳《大刚报》）

一次偶然的采访

——记周总理1959年接见电影界

丁 浪

说起来，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一次偶然的采访，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总理爽朗的笑声、慈祥的面容，总是如在耳边，如在眼前。

1959年，是我国电影创作获得丰收的一年。为了迎接建国十年大庆，电影界的同志们鼓足干劲，拍了一批优秀影片，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这一批影片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是热烈的、空前的。11月12日下午，影协的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说晚上在北京饭店开联欢会，庆贺1959年国产新片展览月的成功，有电影界、文艺界著名人士参加。当时，我在《北京晚报》副刊当编辑，负责电影评论，但没有直接采访任务，可去可不去。我想，这种场合，大家在一起玩玩，无拘无束，交谈随便，是编辑记者认识人、了解情况的好机会。当时晚报的负责人对编辑记者参加这些活动总是充分信任和大力的支持的。

走进北京饭店大厅里，灯火如昼，佳宾满座，有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剪接师，有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还有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等。人们被一种喜庆丰收所特有的气氛感染着，欢乐的面孔、喜悦

的眼光、亲切的声音，让人觉得辉煌的灯光也带着笑意……，影协的同志悄悄告诉我：“总理来了，开会前他要在小会客厅接见一部份编剧、导演和演员。”意外的消息，使我惊喜得差点跳起来，“太好了。”脑际里立即产生这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重要的动人场面详尽地记下来。于是，我连忙找影协负责人袁文殊同志，把自己想法说了，并得到他的同意，也得到文化部的夏衍、陈荒煤同志的同意，我高兴极了，便同工作人员一起，在小会客厅前等候总理，心里很不平静。自己到报社才三年，是新闻战线的一个新兵，什么也不懂，从来没想过在采访中会遇见总理，真是又激动又紧张，早早就把采访本拿在手上，两眼不停地只顾注视着前方，别人在一旁的活动，我也听不见看不见了。

不一会儿，总理在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等同志陪同下，健步走来了。他满面笑容地同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握手，我紧紧地握着总理的大手，向他问好。总理慈祥地看了看我，他的眼光是那样亲切，神情是那樣的和蔼和平易近人，使人感到温暖，无拘无束，刚才那种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了。我立即紧紧地跟随总理，走进会客厅。

在小会客厅的同志，都为总理即将接见而兴奋地谈论着，眼光也是不断地望着门口。当总理微笑地走进会客厅的时候，大家纷纷站起来鼓掌。总理象老朋友见面那样同每个人热情地握手，同时专注地看着他们，他亲切地询问着、倾听着。电影工作者也把总理当成自己的长者，谈起话来象叙家常那样自然。总理同影片《青春之歌》的编剧杨沫同志握手时，问道：“《青春之歌》下部着手写了没有？”影片的导演崔嵬同志在旁边插话说：“有人说影片将近三个小时，太长了，长得可以分

上下集，如果再拍下部，那一共得拍四集了。”总理笑着说：

“《青春之歌》这部片子长是长，但看了不累。”话音一落，崔嵬、杨沫同志高兴得发出爽朗的笑声。总理又问起《青春之歌》的演员，同于洋、谢芳、赵联等同志亲切握手，说《青春之歌》的摄影有特点，称赞摄影师拍得好。紧挨着他站着的是秦文，夏衍同志给总理介绍说：“她是演《青春之歌》中的王晓燕的秦文，秦怡的妹妹。”总理握着她的手说：“你们姐妹俩合演《第十二夜》就好了，高矮差不多。”总理谈笑风生，很快使小客厅充满欢乐的笑声。

总理平易近人的风度和同志们的欢乐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想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采访机会啊！我一定要把它报道出去，让更多的人分享这幸福的接见，我于是更仔细地记着。

总理看见著名演员蓝马，称赞他在影片《万水千山》中演教导员，演得不错。并说：“现在放映的《万水千山》实际是个下集，它反映的是遵义会议开始以后的故事。”他希望把《万水千山》上集快点拍出来，这样，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银幕上就得到完整的反映，才能全面体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伟大意义。蓝马同志告诉总理：“上集准备从打下娄子关开始。”总理点点头，强调说：“一定要突出遵义会议，突出毛主席在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挽救党，挽救红军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还要写好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辉胜利，因为那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

我想总理的见解多么精辟，总理的指示多么具体又多么重要啊！我紧紧跟在周总理的身边，边走边记，只想一字不漏地记下来。总理看看我，没有阻止，我不觉得害怕也不紧张。这

时，林默涵同志见我埋头记录，问我：“你是不是总理办公室的？”我连忙说：“不是，是北京晚报的，想写篇通讯，写完是不是直接送中宣部，请你审查。”他点点头，表示支持。

总理见他们都是北影、八一制片厂的编、导、演，便关切地问：“长春制片厂和上海的制片厂有没有人来？”长春和上海的同志大声回答：“来了。”他们马上围上来同总理亲切握手。总理称赞《冰上姐妹》宣扬了集体主义思想，色彩不错。有同志告诉他海燕电影制片厂拍的《聂耳》也很好，总理高兴地说：“聂耳嘛，当然会好的啰！”大家一听都笑了。

接见后，大家同总理一起走进大厅。人们一见总理来了，热烈地鼓掌欢迎，整个大厅都沸腾了。在周扬、夏衍同志讲话后，总理在掌声中讲了话，他声音洪亮、语调亲切，所有的人都认真地在聆听着。总理对我国的电影事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十年来，电影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进步，电影的风格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它推动我们劳动人民前进，它鼓舞我们用战斗的精神，去实现高尚的美好的工人阶级理想。”总理十分关心电影队伍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培养新生力量。他说：“电影界同其他艺术界一样，新生力量正不断地涌现出来。新老结合的精神，在电影界表现得还不坏。我们看过的《青春之歌》也好，《五朵金花》也好，《冰上姐妹》也好，都是有新演员参加的。很多新的好的片子就是从文工团、从业余的文艺爱好者中间选出来的优秀演员。将来还可以从摄影爱好者中间吸收优秀的摄影师，从戏剧爱好者中间吸收优秀的导演，从文学爱好者和宣传工作者中间吸收优秀的编剧和编辑，必须把现在的电影队伍、电影联谊会的组织扩大起来。从

宣传部门和文艺界其他部门，从业余爱好者中间去发现和吸收新的人材，发展和壮大电影队伍。”

总理的讲话象一团火，把人们蕴藏在心里的理想之火都点燃起来了，老中青电影工作者在一起，亲密团结、精神振奋，完全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整个大厅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接见结束后，回到家里，灯下，我打开采访本，上面歪歪斜斜的字，有些恐怕只有自己才能认识。我重温着这次幸福的接见，领会着总理的指示，同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我也在想，在领导没有分配任务的情况下，如何识别新闻价值，主动地抓住机会，不失时机地进行采访。

限于晚报的篇幅，我连夜赶写了一篇很短的通讯《丰收的晚会》，送林默涵同志审阅后，于11月14日见报。以后香港《周末报》还作了转载。

前两年陈荒煤同志见了我，讲到十七年电影的得失，还谈起那次周总理的讲话，问我那次的记录还能不能找到。

自称小伙子，实乃老少年

——采访将军、诗人冯玉祥

丁 浩 海

有一个作家曾用这样一句话来刻划那些值得纪念的人。他说：凡是死后而仍活在人民心上的人，都是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背影的人。

三十六年前的1946年5月11日，我在雾都重庆的一次采访中，就留下了这样一种永不消失的印象。我当时的采访对象——曾拥兵数十万、著名爱国将领的西北军统帅冯玉祥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朴素的住处，简陋的摆设

冯将军家住上清寺的一处平房。我直接就跨进了他的客室。我感到有些奇特。这么朴素的房间，也能容得下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吗？会客室里难得找到一件款式新颖的家俱，连茶壶茶碗也是最普通的。从墙上挂的照片判断，这就是冯将军家。

经通报记者来访，冯将军左手拿着一本书，很快地从内室来到会客室。他那魁梧的身躯，紫铜色的面孔，坚毅的神情，反而使我感到亲切极了。他向我伸出右手——那温暖的大手，那